

时

萌
著

中國近代文学論稿

錢仲聯題



封面题签 钱仲联

中国近代文学论稿

时 萌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2 印张13.5 字数288,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2,700

统一书号: 10186·692

定价: 4.00 元

0285/22

目 录

晚清小说理论探索·····	(1)
晚清小说理论及有关佐证纂目·····	(35)
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看法·····	(41)
李伯元的讽刺艺术·····	(49)
《孽海花》创作规划全貌管窥·····	(101)
——兼考曾朴手拟《孽海花》人物名单及金、曾合拟六十回目	
《老残游记》艺术欣赏·····	(135)
吴趼人思想、创作纵横谈·····	(165)
晚清文坛论翻译·····	(193)
鲁迅《域外小说集》的启蒙意义·····	(209)
周桂笙与徐念慈·····	(219)
〔附一〕 周桂笙行年及文学活动考略·····	(235)
〔附二〕 徐念慈年谱·····	(247)
论桐城派·····	(263)

评说常州词派.....	(287)
近代宋诗运动的渊源与倾向.....	(331)
论章太炎的文学观.....	(355)
南社前期的文学思想.....	(371)
苏曼殊诗漫评.....	(391)
关于金松岑.....	(401)
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若干问题商兑.....	(405)
后记.....	(423)

晚清小说理论探索

晚清时期,小说理论出现了繁盛缤纷的局面。

在我国文学史长河中,小说一向被正统文人视为小道而不齿,加以种种訾议和压抑,直到宋元话本出现,明清小说繁荣之际,才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自古以来只有诗话、词话和文论,而一直未创立小说理论。直到封建社会分崩离析的末期,随着社会现实的急剧质变,小说空前繁荣,小说理论才随之风起云涌,在文艺理论领域中开拓了先河。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重视。

从晚清小说理论的质来考察,它虽披蒙着相当浓重的改良主义色彩,但在时代浪潮的冲激下,其中也茁生着积极向上的超越了改良主义的思想因素,尤其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更使小说理论中增长了新血轮。至于论其量,则空前丰硕。所以,值得加以整理剖析,披沙沥金,去芜存菁,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以丰富祖国文学理论的宝库。

晚清小说理论从无专集,只散见于报章杂志或个人著作中,就目前见闻所及,已有近百篇之多。就其内容言,有作家与作品论,有发展史的述评和考证,更多的则是批评和创作理

论,触及面之广,足以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就其形式言,有随笔、丛话、诗、专论与论赞,还有调查表、集目、序言与后记、书评、传记、史论、发刊辞,可称多姿多采。

现有少数文学史著作,虽对晚清小说理论作过专章介绍,但接触的深度与广度两皆不够,实则未窥全貌。所以,有必要重作发掘与研究。

这里,拟先就其核心部分——对小说政治性与群众性的阐发,对小说艺术特征和创作论的认识,试作一番探讨。

对小说政治性与群众性的认识

晚清小说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核心,就是把一向贬为“小道”的小说提到为政治、为社会服务的崇高位置上来,强调其接近群众、便于发挥社会教育作用的优越职能。然而,由于其中掺杂着梁启超一派改良主义者把小说夸大为可以左右群治、操纵世界的唯心主义论调,故使这个“核心”蒙上了不健康的色彩,从而影响了人们对它作出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我们只要比较周详地对整个晚清小说理论体系巡视一遍,就可发现这个“核心”并非由改良主义观点单独构成,实则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混合体。这“核心”中除蕴有改良主义观点之外,也还有民主革命派刊物的倡见,也有不属派系而倾向于进步的文学理论者的见解,也有向往革命的小说创作者之实践体会,更有着对梁启超那种唯心主义观点的痛切批判。问题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从而汇百川为大河的。因之,这个“核心”的具体内容也并非由改良主义观点全部占领,其中也还有对小说提出之种种不同的要求:有从宣扬爱国民

族意识出发,有从倡导民主革命着眼,有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呼吁,有从暴露与抨击专制统治促其崩溃落笔,有从反对封建教化倡言婚姻自由立论,——所以,这个“核心”实是由各式各样进步主见构成的“四棱八角的丛聚”。即使以其中带有改良主义倾向的一环来看,也不单纯是出自梁启超那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所谓小说改造人心、改造世界的那一套论调,其他也还有倡言小说应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宣扬普及教育或者反对旧礼教风俗等等主见,就当时历史环境看,也还有着一定程度的启蒙作用。故而,谈到晚清小说理论就笼统地冠以“改良主义小说理论”之说,实在是不恰当的。

应该看到,这四棱八角的丛聚之出现,乃是近代政治思潮错综复杂急遽变化的客观反映。正因为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这个极其短促的历史途程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民主主义消长交替的状态非常复杂多变,故反映到作为文学思潮之一的小说理论上,就表现为诸种观点的丛聚交织,鱼龙混杂。

所以,对晚清小说理论中强调小说的政治性及群众性这一课题,如何发扬其积极面,批判其消极面,必得将其放到政治思潮激烈动荡变化的时代背景中去作历史的、辩证的全面考察,才能使所作的结论客观一些。

现在,就来作一番巡礼。

阐明小说的政治职能与社会教育作用最早的,确是改良派论者。首先是严复、夏穗卿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认为小说“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接着又出现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前者夸说欧洲各国之政治变革和进步全归功于政治小说,故

小说为“国民之魂”；后者的主要论点即是：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他倡说此种观点的理由，一是认为小说最普遍近人，它与人们关系之切近犹“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二是认为小说具“不可思议之力”，可以支配人道，左右政治，改变社会，甚至夸说小说魔力大，“用之于善，则可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毒千万载”，故认为“欲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继起发扬类似论点的有陶曾佑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论小说之教育》、《月月小说叙说》、《论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小说理论。它们或倡言“欲救中国，当以改良社会为起点；欲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驱”；或认为欲“扩张政法”、“提倡教育”、“振兴实业”、“组织军事”、“改良风俗”无不唯赖小说来“诱掖”；有的则认为小说乃普及教育传播文明的利器；也有的希冀“以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甚至夸大说“有新世界乃有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小说势力之伟大，几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这些风行一时的改良主义观点，正如以往文学史论者所分析的，是有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的。说它消极，因为它从唯心史观出发，夸大小说可以操纵以至创造世界，这就是宣扬

只凭主观意识即可决定客观世界的变化，显然这是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也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就时代思潮来考察，这当然是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发酵而成的衍化物。因为改良派就认为当时的政治腐败、国弱民蔽不是封建土地占有制经济基础和专制政体上层建筑的罪恶所造成，而是由于中国百姓愚昧落后不文明所致，因此倡言改革中国现实不必摧毁原来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只要改造人心，变易道德。就这一意义来剖析，则更可透见这“小说创造世界”观点的实质是极其反动的。说它积极，就是因为小说素为封建士大夫所践踏，视之为消闲逗趣的“小道”，甚至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妖言邪说。经过这样大声提倡，把小说从贱视中拯救出来，推上为社会为人类服务的重要位置，引起普遍重视，促起了当时不少批判现实的“谴责小说”的繁荣，这无疑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那么，这些观点所散布的影响究以积极为主抑或以消极为主呢？则还得放到它们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去分别考察。譬如在民主革命高潮还未正式形成以前，由于它最先反映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透露了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文化传统抗衡的苗头，故而这些观点的启蒙作用就处于主导地位；及至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涌起逐渐汇成时代思潮主流以后，这些观点的启蒙色彩便淡褪而消失了。

还有些蒙受着改良主义一定影响的观点。如有的倡导写科学小说以求“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小说林缘起》）；有的认为可“以小说而力破其神鬼之迷”，“灌输以文明”（《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有的则以为小说以严肃的匡世求知态度“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者为贵（《余之小说

观》)。这些理论虽则还是由改良主义思想派生，但由于它们未在根本原则上从梁启超那“小说创造世界”之唯心主义观点来落笔，因此也就显出了客观作用上的两重性：就其局限的一面看，它们只是抽象地倡导小说应创新祛旧，而未从革命改造现实的角度来指导小说的创作实践；但它们积极要求小说摆脱迷信、色情和滑稽，从消闲解闷的圈子中跳出来，转为描写社会生活，反映时代朝气，介绍新鲜事物，从这看来，则又有其一定的启蒙意义。

此外，还有种种瑕瑜互见的论说。它们同时包蕴有消极与积极两种思想因素，往往自相矛盾，甚至谈到后来，违背了自己的原意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红楼梦新评》的作者季新，提出法国革命以小说家福禄特尔鼓吹革命之力居多，故而，自诩也从革命的态度出发，将曹雪芹推到同福禄特尔一样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用意似至善。但季新却又由国家的专制流毒谈到家庭专制之流毒，揭示其批评《红楼梦》的目的是“欲以科学的真理为鹄，将中国家庭种种之症结，一一指出”，因为“国者由家庭发达而成，欲变更国家组织”，必“先变更家庭组织”，最后却导出了“故今日中国救治之策，第一须变更国人对家庭之观念”的庸俗的改良主义结论。又如《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及《绣像小说缘起》，它们阐发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的立意均是本着改良主义倾向出发的。但前者却着眼提出了中国数千年来只有“君史”而无“民史”这一事实，并指出其症结乃在于“专制时代，凡事莫不以君主为重”之故，从而提出对有些“借渔樵之话”来反映历史真实的小说应予以重视，“可作民史读”。虽则它未能循此作进一步的阐发，但在小说理论建设初期能如此立论，是可取的。后者则能严肃正视社会现实，从

“庚子一役，近事堪稽”谈起，提出小说不仅应“醒齐民之耳目，”而且还应“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这样从爱国立场来倡导小说，也颇有积极意义。——对于诸如此类瑕瑜互见的论说，我们也应去芜存菁，发掘其积极因素。

除上述各端外，能正确阐发小说社会作用的，“理论”中还有更明朗更积极的“核心”部分，那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与其他进步论者的见解。

民主派小说理论的最早出现，也是在十九世纪末叶，可以说，它是与梁启超一派的小说论交织出现的。当时，民主主义思潮还未发展为时代主流，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在社会上还起着主导影响，而且，民主派与改良派还未形成壁垒分明的对立，两者在政治与文学交往上还保持着若干友谊的联系，故民主派小说论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正与他们的政治思想一样，还未完全能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所不同者，由于两者阶级性格与政治思想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差距，所以民主派的小说论中就呈现出较多的先进因素，迸发出较多的资本主义文学要求，宣传民族与民主革命思想也较为显豁，表现为冲击封建文化的客观作用也比前者强烈，这是超越了改良主义小说理论之处。

首先一种是革命派刊物的主张，一九〇二年创刊之《游学译编》在其《发刊叙论》中表明所以要倡导小说，乃着眼于小说“近于语言而能唤起国民精神”，能促使“国民的进步”；在谈创作主观态度时，则据俄国学者特儿斯特之艺术观点以强调“作者之主题当如何，则必以直接或间接向于人类同胞的结合，而求其好果，以为感情之用”；在涉及小说客观效果时，则强调

“作每一字”都得“为国民之全体谋公益”；在涉及小说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这一问题时，则召唤：“国民乎！其有以《西游记》活泼不羁之自由主义，《水浒传》慷慨侠义之平等主义，而为《三国演义》竞争剧烈之独立主义者乎？”——其中除《三国》一说显有谬误外，察其倾向，可说基本上是立意在与封建正统对立，鼓吹自由平等，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其次，还有与此同一倾向的一些进步论者的观点，说法多种多样。有的是“借古证今”来指导小说创作，指出“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出焉”。持论更激烈的则还有定一的论《水浒》，认为此书是“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说施耐庵之作此，实有二种主义。一为“民主民权”，另一则是“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作此以“鼓吹武德，提倡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新小说》、《小说丛话》）。也有通过评介西洋小说时对中国读者所输影响来估价小说与革命现实之关系的，如比较具有民主思想的金松岑，在这方面就作了很有益的阐发。他表示崇拜“十五小豪杰”，希冀国人能效学小说中人物的“冒险独立”“建立新共和制”之奋斗精神；又表示崇拜“东欧女豪杰”、“无名女英雄”，因为她们能“使吾国民而皆知苏菲亚、亚晏德之奔走党事，次安、绛灵之运动革命”，掀起“汉族之光复”的激情；又表示读《黑奴吁天录》而为其被压迫的遭遇而悲愤，说从中看到“吾国未来之小影，恐不为哲尔治、意赛而为汤姆也”，指出中国人也会如黑奴之起来挣脱镣铐击碎奴隶的命运的（《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

这些论点，无疑是大大充实了小说理论真正的最有价值的“核心”，因为它们的鼓吹民族与民主革命思想，确是超越了

梁启超一派的改良主义观点。虽则，在把小说由历来受歧视的境地推崇到为社会为人群服务的崇高位置上，梁启超他们不无提倡之功，但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叶那呼唤火和剑的动荡年代里，真正把小说提到为革命现实服务的位置上来的，乃是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论点。它们较为明朗地强调了小说应该鼓舞人们反压迫、争自由的战斗意志，也强调了小说应该抨击封建专制与民族压迫、否定旧礼教，更倡导小说鼓吹革命，发扬活泼不羁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它们是以比较正确的态度，阐发了当时社会对小说的现实要求，赋予小说新的生命。

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头几年中出现的小说论，就是代表了整个晚清小说理论体系的前期状貌。

在这一阶段里，改良主义小说论是以先导姿态出现的。它在文学领域内所占比重大，影响亦广，也起过一些启蒙作用，直至民主派小说论一出现，遂黯然失色。民主派小说论的可贵处就在于把小说提到了鼓吹革命的高度，即使它所提小说应唤起国民精神这一点虽仍未脱唯心史观的桎梏，但比之改良派的嫌百姓愚昧落后，也显得积极些。然而，由于民主派文学者也还是脱不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制约，并且前期也还受改良主义思想之羁绊，故同样也表现出了命定的局限的一面。譬如在小说应唤起国民精神促其进步这一点上，就提得含糊朦胧，颇显进化论意味；又如它所鼓吹的《水浒》的“侠风”、“武德”、“慷慨侠义之平等主义”及《西游记》的“活泼不羁的自由主义”，也流于主观空想，缺乏明朗的阶级内容；又如有的人竟将《三国演义》中封建统治集团争夺天下之所谓“竞争剧烈之独立主义”与近代革命等同看待；如此种种，均显出其思想

体系的矛盾与混乱。尤其是金松岑，他在《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的关系》一文中既鼓吹小说应与革命现实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小说只可正面描写符合“道德”准绳的理想人物以教育读者，而大大非议《迦因小传》、《茶花女遗事》一类新小说，斥为“淫词”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他又认为小说应倡导道德法律，以“使道德法律得持其强弩之末以绳人”，这就是他们思想中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的明证。

就小说理论前期看，改良派的影响大于民主派。因为这一阶段的意识形态领域内，改良主义思想市场较大，后者仅是初露头角；在文坛上亦是如此，前者的论说犹若雨后春笋，而後者的文章则出现得零星而单薄；更何况，此时的民主派小说理论还未能完全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呢。

从一九〇三年发展到一九〇五年，小说理论体系进一步起了质的变化。

如果以一九〇五年作为晚清小说理论后期的起始，那么它的特征是：改良主义小说论仍持续发展，但还未逾越梁启超那《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论点范围，故而与时代思潮与现实要求愈加背悖，显得苍白无力；代之而起的民主派小说论则渐趋成熟，促使小说理论体系起了内质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也是紧密关联着时代政治思潮的消长的。一九〇五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汇为时代主流，随着改良主义政治思潮的衰颓与没落，革命高潮的涌现，因而改良主义小说论表现为羸弱疲软，而民主派小说论所体现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则比前一阶段更形强烈，文学思想的影响遂亦转为主导地位。

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故后期小说理论的表现特征是：民主

派及一些其他的进步文学理论者从革命的高度阐发了小说的社会作用,提出了与梁启超一派截然不同的先进见解,与之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斗争。

表现得比较旗帜鲜明的民主派论者王无生(天谬生),就颇多新见。他认为创作小说应着眼于反映现实、抨击黑暗、伸张正义和启发抗争。提出写小说是为“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而作;也注意到了选择题材的现实性与表现形式的群众性,强调写小说应该“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择体裁之能适于国民之脑性者”。又指出小说创作者在“确定宗旨”“厘定体裁”时应该抱让作品密切结合现实、倾向积极健康之写作准则:“宜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凡一切淫冶佻巧之言黜弗庸,一切支离怪诞之言黜弗庸,一切徒耗目力无关宏旨之言黜弗庸。”

此外,还有些倾向于民主派的论者,也以进步的观点阐扬了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如《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的作者(此文刊于《新世界小说社报》,未署名),所发主张也颇有神采。他赞颂法国福祿特尔以小说鼓吹革命是活了已死之人心,使之奋起反对罗马教皇的统治;他也推崇施耐庵之以宋江百八人之传记载刺异族虐政和抨击理学遗毒,发扬了否定夫为妻纲的女权思想和对抗民族压迫的尚侠思想,尤其称扬施耐庵那鼓吹民族革命、反对封建皇帝压迫的民权思想是使中国人明晓了民约之义,并由此出发,主张小说要反映“家国之悲,种族之痛”,强调小说作者的实践应以“察社会之程度、国民之心理”为前提。还有《小说林》编者徐念慈,他也着眼于小说的反映现实与推动社会进步。他认为小说乃社会的产物:“有社会始成小说”,所以小说既应反映“社会势力之发展”,又

应能动地发挥“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战”的作用。在论述新小说的客观效能上，他认为“其纪事陈义”应“合于今理想”，又认为它能“警告”人们“恍然悟而瞿然惊”，从“时势的推移”中明晓现实生活“外界之变动，内容之代谢”，从而断言“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

不难看出，这派论者在阐发小说的社会作用上所持的哲学思想基础，与梁启超那一派是有着本质差异的。分歧主要之点在于：梁启超派是片面强调小说创造世界，小说先改造人心而后即可改造现实，这就是意识决定存在；民主派则先肯定小说是客观世界的产物，然后再涉及小说之能反映现实并起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而这个分歧，正就是唯心、唯物的分野。虽则，王无生、徐念慈他们本身未能作出这个结论，但与梁启超派观点上的本质差距却是显然的。

当时，在估价小说的社会作用这一问题上，不仅出现了两种观点的对立，而且存在着斗争。如王无生就不赞成梁启超那样把小说夸张为改造社会的唯一工具，他指出以改良社会为标榜的“新小说”虽“汗牛充栋，而效果仍莫可一睹”，其中也有作者动辄标榜“投时好”，但实质上其创作动机并不在于求“警醒国民”和“裨益社会”，而是在于“得重赏”；又指出如这类作者就不能以“小说重任畀之”。他认为对新小说也应区别看待，主要乃考察作者的主观愿望与作品的客观效果是否反映现实有益于人群。徐念慈则更明确提出了“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的论点，对那些“小说创造世界”论的唯心主义本质表示了鲜明的对立，并且对改良派所宣扬的“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惟小说是赖”的观点也完全否定。随着时代思潮的冲刷，即改良主义小说论者内部，也在观点上

起着分裂和斗争。如比较清醒的吴沃尧就指出：“今夫汗牛充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其能关系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谓必无，然而怪诞支离之作，佶曲聱牙之译本，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他人读之不知谓为何，吾视之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然而彼嚚嚚然自鸣曰：吾将改良社会也，吾将佐群治之进化也，随声附和而自忘其真，抑何可笑也。”（《月月小说序》）此外，《小说林》另一编者黄人（摩西），也对改良主义者那“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课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无一不偏于小说”的观点表示非议，指出那是言之太重，是脱离了小说实质的过分夸张。所惜者，他对此未能作深邃的探索。

综上所述，就其大体看，民主派的观点在晚清小说理论后期确是占了主导地位，也确是给它的“核心”抹上了亮色。文学史实也证明，这些进步的小说理论确在指导当时小说创作上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以上所举诸种论点，可说是代表了民主派小说论的基本的积极的一面。

但如细加推究，从中也还是使我们看到，由于它本身命定地受制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故而也不能不露出其局限的一面。

就时代背景来考察，当一九〇五年起始，标志着革命高潮涌现的同盟会成立以后，民主派在政治思想上已与改良主义阵营展开了壁垒分明的论战，可是在文学领域里则远远落后。表现在小说理论上，民主派仅仅在对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与对新小说的估价上表示了一些与改良派的分歧，而且也只作了浅尝即止的批评，这就充分意味着：这个时期民主派的文学思